

从检察官岗位退休后,我着手研究百年前丹麦人在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的历史,历时十年,笔耕不辍,形成二十万字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并搜集了大量历史照片。

# 一个中国检察官的丹麦故事

□孙鸿路

## 缘起

7月28日清晨,我打开iPad,看到一条消息——  
鸿路弟,昨晚世上上网约我说话,他刚从美国回香港。8月底,将去北京当评委,想在此前先来青岛,邀请你来一道游玩几天,此行一切费用世光承担,他特地让我说明,难得我们这么多年来,终有一个时间可以面对面交谈啦!

我非常激动,马上告诉了妻子,和她分享这愉悦,准备踏上飞往青岛的旅程。

崔世光是著名钢琴家、作曲家。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时,10位世界著名钢琴大师和天才新秀在国家大剧院演奏的《喜庆中国》,就是他的作品。这次来京是应邀担任2017年“斯坦伯格杯”全国青少年钢琴大赛总决赛评委。给我留言的是他姐姐崔美玲。

我与这位钢琴家的缘分,要从三二十几年前说起——

1983年11月26日凌晨,我冒着初冬的寒冷,匆匆赶到火车站,那是一趟4点40分由丹东开往沈阳的慢车。和我同行的是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他是崔世光的父亲崔锦章先生。

1979年,崔老先生的冤案得以平反,领导派我同他回青岛落实住房问题。从火车一声长鸣奔驰起来,我便怀着好奇的心理开始了“采访”,听崔先生慢条斯理地述说。

到了崔家——伏龙路四号,那是一座老教堂的查经室,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老教堂已经变成了大杂院。崔太太王澄美曾是一位音乐老师,少时跟俄国人学钢琴,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期间,钢琴也是她的选修课。

从和两位老人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安东历史上的一件稀奇事:百年之前,很多丹麦人来到此地,最多时竟达七十多位,有医生、护士、教师、园艺师、工程师。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医院、学校、育婴堂和贫民救济所,很多人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 足迹

“丹麦人与安东”这个话题,一直留在我脑海中,这是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我应该为家乡留下一段岁月的见证。

百年前,丹麦人为何从遥远的北欧来到小城安东呢?官方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较为简括,所以,我要走访旧地,寻访故人。

几年来,我肩挎背包,带着相机和简单的食品,从城市到农村,从县城(东港、凤城、岫岩、宽甸)到海边,凡有丹麦人建筑的地方,无论是礼拜堂、育婴堂,还是医院、学校等,我都要驻足。记不清走了多少回,对着这些“石头写成的史书”,也记不清按下了多少次快门。

在触摸这些老建筑的同时,我采访了与这段历史有关的人物。

丹麦人在安东的活动,最早起源于大孤山(1896年),有一位丹麦女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加入了中国国籍,1960年去世,埋葬在孤山脚下,终生未嫁。

采访中,我得知照料她晚年生活的曾是孤山教会的厨师,名叫“王成仁”。由此,我便开始寻找王成仁。但是,1959年王成仁以反革命罪被捕,获刑15年,出狱后下落不明。我想,既然有案底的人,到司法机关看卷便是了。结果,当地司法机关查无此人。于是,我又回到孤山。事隔几十年了,王成仁已经被岁月所淹没,我只好走街串巷,四下打听,终于遇到了一位叫张文厚的知情人。



1910年,丹麦人与中国同事在大孤山留影。右一是聂乐信小姐,在她身旁的是丹麦牧师柏卫先生,左一系其夫人米娜,左二是丹麦教士郭慕深Karen Gormsen小姐,系安东基督教女子医院及育婴堂的创立者。

原来,王成仁入狱后,妻子自缢身亡,时年六七岁的女儿也被送到庄河了。我赶到庄河,从户籍上查找王成仁却没有结果。我有些蹊跷,地方的史记明白写着“教友王成仁帮助照料她(聂乐信)的生活”,怎么这个人就无影无踪了呢?此时,我忽然想到,既然知道何时被捕的,那么把当年被捕的王姓男人“过筛子”,或许从中间会发现踪迹。于是,我又回到检察院,记不清看了多少本卷宗,就在头昏眼花之时,忽然一行字跳入眼帘——

“王生仁 男 反革命 住孤山(教堂炊事员) 1959年8月29日被逮捕”。接着,卷宗出现“丹麦人聂乐信”的字样,我顿时心跳加速,真是山穷水尽之后柳暗花明。“王生仁”正是我要寻找的那个“王成仁”,一字之差,乃是“乡音”惹的祸。

从在育婴堂长大的孤儿到丹麦人所建医院的医生、护士;从上世纪20年代与丹麦人共事的牧师的子女到上世纪60年代参与安葬最后一个丹麦人的乡亲。有些人已经安息了,我便去寻找其后人。算起来,我大约采访了三十多人,其中有的采访数次。被采访者多为花甲之年,有的甚至是耄耋老人,让这些老人去回忆百年来的风雨苍黄,实在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采访也有吃闭门羹之时,如一个自杀的牧师之子,几经周折,历时半年之久,终于有了联系,但始终不肯露面;还有一个老人,他的父亲曾在大孤山贫民救济所饲养奶牛,由于家贫,他五岁时就被聂乐信收养于幼稚园。我拎着水果上门拜访,但任凭你问什么,他就是三缄其口。

令人哀伤的是,采访中两位老人先后去世,时不我待啊!

## 溯源

采访中,我听说几乎每年都有来瞻仰老建筑的丹麦人。我想,如果能和这些丹麦人搭上线索,我的采访或许又能多开一扇窗。

恰巧,孤山的李芳女士送给我一本丹麦杂志,里面有一幅插图,是几个丹麦人和中国人在孤山关帝庙前的合影。我如获至宝,经过走访,认出了照片中当年生活在孤山的聂乐信小姐和柏卫(Conrad S. Bolwig)、米娜(Minna Hass)夫妇。我想联系图中人的后裔,寻访中联系到一位驻京的丹麦记者,我抱着碰运气的念头开始发信,附上那幅图片。他很热情,给我介绍了一位年轻丹麦人西蒙,他出过一本书,讲述丹麦人在满洲的历史。

西蒙向我提供了一个丹麦邮箱,说一位尤根(Jorgen)先生可以帮助我。给尤根去信后,很快收到了回复,并且,还发来了一份英文资料,作者是美国人罗夫·莫特(Ralph Mortensen)博士,他对聂乐信小姐在大孤山晚年时的书信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写成了一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

2012年春,尤根先生来信告诉我:父辈曾在安东工作过的包爱光(Helga Pallesen)女士来访的日期和下榻的宾馆。当年5月19日晚,我如约来到包爱光女士的客房。迎接我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这时我才知道,尤根先生是丹麦教会的秘书,曾在南也门和阿拉伯做了10年传教士。与包女士同行的还有两个姑娘,是她的女儿和外孙女,她们在我带去的丹麦杂志里看到丹麦人在大孤山的合影时,惊喜地叫起来。她俩表示把杂志带回去,找时间翻译为英语,再还给我。太令人兴奋了,这篇文章终于可以“揭晓”了。

包爱光告诉我她的父亲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曾于1914年在大连山崇正女子学校(聂乐信所建)任教。我邀请她去大孤山时,她笑着连连点头“好好!”

三天后,我陪包女士打的来到了大孤山,那天天气极好。

当她看到女校有些房子已经化为残垣断壁,不由得轻声叹息。又听说聂乐信的坟墓也不知何处了,更是触景生情,说起她的母亲包珍珠(Margrethe Aagaard Poulsen)的故事。

她的父亲在劈柴沟当校长时(丹麦人所建三育中学),母亲做音乐老师,同时,在家开了一个小诊所。1927年,爱光出生了。1945年伤寒流行,母亲每天给病人送药。在治疗一个发病的男孩时,她被传染了。病重时,她还说起劈柴沟的奶牛可能有结核病,担心孩子们传染了。几天后,不幸去世。

这次来,包爱光想去母亲墓地献上一束鲜花,可是那里只有荒草萋萋……

包爱光回丹麦后,找到了柏卫和米娜的孙子Niels Geert Bolwig,这位先生听说有一个中国人在研究先辈的历史,喜出望外,抱病和夫人整理出他祖父母在大孤山的工作和生活的文字发至我的邮箱。尤根先生说过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丹麦人是有历史责任感的。

## 遥思

一座城市要有自己的历史,就如一个人不能没有自己的童年一样。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挖掘和了解家乡的历史,我内心产生了一个纪念丹麦人的活动计划。首先,组织发起了一个纪念丹麦郭慕深小姐来华110周年的活动。

清末,26岁的郭慕深(Karen Gormsen,1880—1960)小姐从丹麦来到安东,在元宝山下建立了安东市第一家女子西医院,带来了先进的接生方法。

当时,妇女生产靠的还是接生婆,文明的接生方法使很多安东的妇女儿童远离了死亡。安东的孕妇第一次有了产房,贫苦人家不但免费,还有护工把小米粥和鸡蛋端到产妇的床头。后来,郭慕深发现医院周边常有弃婴,有女孩,也有残疾儿,甚至冻饿而死。她向官府提出了建立育婴堂,收养孤儿,但没

有得到“恩准”。不久,安东遭遇瘟疫,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安东的丹麦人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救灾之中。当局感念于此,便在青龙山下拨了一块荒地,由此,郭慕深建起了育婴堂(1916年)。建成三十余年来,抚养了三百多名孤儿,而她孤身一人,终生未嫁。1950年底,郭慕深已是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她告别安东,乘船返回丹麦。

我召集参与纪念的人员,很多都是与这段历史有渊源的人,如当年育婴堂的孤儿刘玉清(退休于某银行职员),育婴堂孤儿林杉(中学音乐教师)的夫人刘秀茹(退休于某厂企管人员);丹国医院助产士刁春霞之子罗文璞(企业家、丹东市人大代表),丹国医院助产士刘葆珍之子于美则(退休工人)……

## 尾声

1934年,在安东十余里外的劈柴沟,一个洋妞呱呱坠地。她的父亲吴立身(Kaj Johannes Olsen,1898—1973)在小学中任教19年。半个多世纪之后,三姑娘已是白发苍苍,从遥远的丹麦而来,坐在我家娓娓而谈。她就是丹麦作家吴坤美(Estrid Nielsen)女士,年轻时就读于哥本哈根大学,曾以“丹麦人在东北(1894—1950)”为研究课题。听说我也正深入其中,她很感兴趣,非常想知道一个中国人笔下的丹麦故事。

在闲谈中,吴坤美女士问起杜鹃花和草莓,因为这两种植物是当年丹麦园艺师在劈柴沟栽培的结果,前者是从山里移植的,后者是从丹麦引进的。我告诉她,草莓生产的规模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杜鹃花已被命名为市花。

崔世光旅游演出时,还特意探望过吴坤美女士。后来,世光在信中对我说:“丹麦教会及民间人士在辽东的史记,以及丹国医院等,在丹麦早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似乎已经被pass了。我看了您的文章个别章节,才知原来并非如此……”

忽然,飞机发生了一阵震颤,我的心不由地收缩起来。世界是如此奇妙,人生又如此短暂,恍惚之间,我想起了这样一句话:“人重要的不是年龄,而是经历,有的人活到一百岁也没经历过什么事。”飞机渐行渐低,我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青岛近在眼前了……

作者简介:孙鸿路,男,1948年9月出生,黑龙江,1990年进入检察机关,先后在辽宁省丹东市检察院法检处、法律政策研究室、公诉处、反贪局、控告申诉处等岗位任职。2008年9月退休后,专心于丹麦人在丹东的历史资料收集工作,已形成20万字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日前,丹东市政府史志办邀请孙鸿路参与当地史志撰写计划中。



清末,丹麦传教士在安东天后宫街建立的基督教医院,俗称丹国医院。

高莽老师静静地躺在花丛中,我总觉得恍惚。这曾是一位多么可爱的老人,每次见面,他总是乐呵呵地跟我聊天;他喜欢画,只要看到喜欢的东西,他就拿起笔来。我曾记得在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曾一个人跑到北京饭店金色大厅,静静地坐在最后一排,拿着笔不停地画着。我凑上前一看,一幅大会场面的素描在很短的时间就在他的手中完成了。我惊叹这位老人的绘画才华。

高莽老师的人物肖像画很有特点。在他众多的画作中,我最喜欢一幅《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的作品。



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谈及这幅画的由来,高莽先生在2013年1月25日送我的《飞光暗度——高莽散文随笔精选》中曾有过描述:

1981年9月,巴老前往法国,途经北京,下榻前门饭店。那天我把一张小墨画像带去。我想,老人如对画像予以肯定,希望他在画上题几个字。巴老看后,对画像表示满意,但说他很少用毛笔写字,这次更不敢用,怕把画像弄坏了。然后又说他想在画,又欣赏了一阵,便在画的右下角处写了一行字:“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这一行字写得特别别致,极有韵味。题款左边又写下当天的年月日。在座的人都叫好。巴金脸上一片笑意。后来,朋友们在我家中看到这幅画时,奇怪我怎么竟敢称呼巴老为“一个小老头”。巴老立刻感到不妥,想了几天,决定为巴老刻一枚印章,盖在年月日的上边,以示题词出自巴老之手,并非晚輩狂称。

生活中的高老也非常可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自己胡子的“折磨”。2013年上半年,高莽老师突然开始蓄胡。一次我去他家探望,商谈他的“历史之翼——高莽历史人文肖像画展”事宜。高老开门后,我陡然看见他的新造型,很是诧异:“高老,您这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充满艺术家的气息?”他笑着摸着胡子说:“那倒不是,每天刮胡子太麻烦,我就干脆蓄起来。我这几天每天看着,感觉还挺好。你觉得咋样?”我说:“挺好的,不过我要适应一下您这新造型。”

后来,当我开始习惯高莽老师“新造型”的时候,他却又开了一个“华丽转身”。一天,我去拜访他,开门打开,依旧是那爽朗的笑声首先扑面而来。可我看高莽老师,总觉得哪里不大对。高老怎么就年轻了呢?对了,胡子呢?胡子咋没了?我握着高莽老师的手,疑惑地问:“高老,您那飘逸的胡须呢?我好不容易适应了,您咋又改了?”高莽老师摇摇头不无遗憾地说:“没办法,胡子长了,我每天都要去打理它,否则老是沾汗,人显得邋遢。我一烦,干脆剪了。这样多好,清爽!”我笑着说:“挺好!您这老虎洞那么大,也确实不需要您这老虎胡须来丈量。”

# 可爱的老头

□慕津锋

说起高老的“老虎洞”,那可真的有的说。这“老虎洞”中,除了高老这只虎,他的夫人也属虎,他的家中还有其它许多不同形态的虎:花布的、毛绒的、陶瓷的、琉璃的、躺着的、蹲着的、趴着的,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俄国的……好家伙,整个一个世界老虎博览会。就连门帘上都挂着书法家程与天手书的“老虎洞”三个大字,还有著名作家杨绛先生题写的“老虎洞”。高老说他家是个“老虎洞”,叫我别怕。我说:“只要我坐的不是老虎凳,我就不怕。”高老听后哈哈一笑。

在客厅书榻的门上,我发现一张极有趣味的《双虎图》。

高莽、孙杰老之留念



不是善类是点眼窝的恩受

双虎图

两只老虎前后坐着,一只捂着眼睛,另一只拿着药瓶。我走近去看,上有题字:“高莽、孙杰老友留念,不是善类,是点眼窝的恩受。一九九八年三月 华君武”。这是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杰作。他将高莽夫妇相濡以沫、相守一生的情感在画笔的勾勒中浓浓地表露出来。

也许正是这种“老虎”情结,让高莽老师充满着童趣。每次,我来“老虎洞”与高老聊天,总是那样惬意。高老喜欢听我摆龙门阵,喜欢听我讲作家们新近发生的事,社会上最新发生的有意思的事情。他跟我说:人数太多了,脚步不太利索,出去的机也会少了许多,老朋友只有电话联系联系了。每每听到高兴处,高老总是发出爽朗的笑声,那笑声让我真实地感受到这位老人的真诚与内心的纯净。

现在,这位可爱的老人走了,我又到哪里去听那爽朗的笑声?

高老,一路走好!

(编者注:高莽(1926—2017),中国著名翻译家、作家、画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长期在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及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翻译、编辑、俄苏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与对外友好活动;同时从事文学与美术创作。2013年11月,高莽凭借译作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获得了“俄罗斯—新世纪”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最佳中文翻译奖。2017年10月6日,高莽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

## 法槌

### 七十四

双方一番唇枪舌剑,之前料想到的问题也都在法庭辩论中提到了,不能到庭作证的王阿三、田莹莹等都成了疑点。

最后,杨忠宣布,法庭辩论结束,根据法律规定,现在由当事人作最后陈述,原告最后什么意见?钱益取说:“请法庭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杨忠道:“被告最后什么意见?”陈其回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杨忠征询双方的意见后说:“原、被告是否同意进行调解?”钱益取向王彩凤低声商量了几句,向法院答道:“原告同意调解,但由法庭对基本事实进行简要认定后再调解。”陈其说:“可以在法庭查明本案事实的基础上调解。”杨忠最后道:“下面合议庭休庭对本案进行评议,评议时间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休庭。”敲响了

## 第十七章 分歧

### 七十五

会议室里,杨忠请大家发表评议意见。

丁连斌说:“我认为本案应认定为无息借款。第一,在借条上没有写明利息。第二,田莹莹的录音和胡平手机发给王彩凤的短信,不能证明原、被告借款明确约定利息的事实。从录音的内容上,似乎双方约定有利息,但胡平也提出了利息过高。胡平发给王彩凤的信息,被告提出,这是由于田莹莹自己的手机没有电了,借胡平的手机发给王彩凤的短信,我对此表示质疑,不能认定这个证据。第三,即使原、被告对本案的借款约定有利息,也是约定不明确的,应当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原告主张有息借款,本人意见不予支持。陆虎、王阿三到沈阳向何启德讨

# 借贷迷局

这是一部以民间借贷为题材的小说,以某基层法院审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为主线,既有对民间借贷这一社会现象的客观理性的法律评析,又有对金钱与人性、爱情冲突的揭示。小说把抽象的法律规范融于真实的故事之中,脉络清晰,法理情理入眼入心。同时本书也是学习探讨借贷法律关系的辅助资料。

债,那60万元债权虽然王、胡各30万元,但是借条只有一份,王彩凤瞒着胡平,单独行使实现债权30万元,这30万元不能归她自己,应当属于与胡平共有,即两人各为15万元。”

## 七十六

杨忠说:“我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的100万元借贷是否约

定利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本案100万元是无息借款,不符合客观事实。第二,被告胡平向原告王彩凤借款30万元,胡平于2009年1月2日归还王彩凤,双方都承认借款月利率为2%,一个月的利息为6000元,而王彩凤称她的借款通过田莹莹的银行账户汇给胡平,数额为29.4万元,另有6000元用现金交付给胡平,胡平在庭



翁华杰著  
中篇小说

支付利息。该100万元借款,王彩凤是否也在借款之前预先扣除了3个月的利息?

“第三,本案原、被告有没有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约定利息?”

“第四,对本案借款利息的认定问题,原告提供的借条,并没有写明利息和利率的计算方法,在证据上可以认定,本案100万元借款没有约定利息的文字依据,这个借贷事实可以得到认定。我的意见:原、被告对本案的100万元借款约定的月利率为3%可以予以认定。”

丁连斌与沈菊交换了一下眼色说:“但我认为,本案原、被告即使约定利息,也是约定不明的,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对公民个人之间的借贷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我还是坚持本案借款为无息借贷的意见。”

沈菊说道:“我也坚持与丁连斌相同的意见。”

## 第十八章 真相

### 七十七

合议庭人员在审判台上入座后,审判长杨忠敲响了法槌宣布:“现在继续开庭。本案经过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合议庭在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就本案事实、证据和适用法律等方面的意见后,进行了认真的评议。在评议中,依据法律规定,运用经验法则、逻辑规则,以法官职业道德、良知和理性,对本案证据和事实作出判断认定。”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转载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 连载(三十六)

本栏目由文艺副刊部主办  
编辑 李红笛